

唐宋时期“文统”概念的理学化转向*

朴成原**

目 录

1. 绪论：研究目的与方法
2. “文统”概念的形成及其初期展开：从刘勰到韩愈
 - 1) 《文心雕龙》中的“文统”原型
 - 2) 韩愈古文运动与“文统”话语的正式确立
3. 北宋理学的“道统”论与文学观的转变
 - 1) “文以载道”论的兴起与“文”地位的变化
 - 2) “道”概念的形而上学转向与“文”的工具化
4. 朱熹的文道关系论与“文统”的重构
 - 1) 朱熹的“文道合一”论与“文统”的理论从属
 - 2) “文统”重构的实践与概念的固化
5. 结语

中文摘要

“文统”概念是中国文学史上指称文学正统性的核心概念词。既有研究多局限于韩愈古文运动或其与宋代理学关系的脉络中对“文统”加以探讨，缺乏对该概念语义变迁的历时性考察。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运用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方法论，特别是“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域

* 이 논문은 2024년 财团法人 社会科学院 金俊烨 Fellowship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이며, 财团法人 社会科学院 및 高丽大学校 亚细亚问题研究院이 주최한 2025 金俊烨 先生 纪念 国际学术会议(2025년 8월 26일)에서 발표한 논문을 수정·보완한 것임. 발표 당시 지정 토론을 맡아주신 唐润熙 교수님을 비롯하여, 질의응답 과정에서 조언과 고견을 주신 여러 선생님들께 깊이 감사드린다.

**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Erwartungshorizont)”的框架，分析了从唐代至宋代“文统”概念的演变过程。本研究发现，“文统”概念在刘勰处尚处于一种可能性的萌芽状态，后由韩愈确立为与“道统”并存的独立文学谱系；但在历经北宋理学家的重构后，至南宋朱熹时期，最终经历了完全从属于“道统”的“理学化”过程。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唐宋文学史实为概念生成、紧张及重构的动态过程，同时也印证了概念史方法论在东亚前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文统、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理学化转向、文道论、文以载道

1. 引言：研究目的与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中，正统标准变动不居。昔日视为革新之典范，后世或成待除之陈腐，此过程循环往复。围绕为文之道的争论，其底层始终横亘着同一疑问：文学因何而存在？何种文章方合乎其本真？

本文关注这一疑问的核心概念词——“文统”。“文统”意指“文章的统绪”，其中“统”兼具体系性构成与正统谱系的双重意涵。本文旨在从“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视角，追踪该概念在唐宋时期的重构过程。在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的概念史论述中，概念不仅是指示其所涵盖关系的指标，亦是影响这些关系内部的因素。¹⁾换言之，概念不限于描述既有现实，更具有建构新现实的力量。且概念的语义并非固定不变。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在挪用同一概念词时，其内涵与外延不断被重新界定。概念史正是追踪此种语义变迁轨迹的工作。

由此观之，“文统”并非仅指文学传统的静态语汇。它是特定时代知识群体围绕文学价值及正统性展开论争的场域，亦是凝缩了论争结果的历史指标。据

1) “概念不仅简单地指示其所涵盖的关系，它也是这些关系中的一个因素(A concept is not simply indicative of the relations which it covers; it is also a factor within them).”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6.

科塞雷克所述，“概念越是普遍，能运用该概念的群体便越多。”²⁾这正意指各群体赋予同一概念以不同意义并借此展开竞争。如“文统”这般具有广泛涵义的概念词，正因其特性而易引发围绕其语义的群体间竞逐。

唐代古文运动将此种确立文学正统的问题提升至正式的历史实践层面。初唐陈子昂等部分文人虽曾批判齐梁文风，探索先秦两汉质朴文体，³⁾但将其以体系性文章谱系形式提出的则是韩愈(768-824)。⁴⁾及至宋代，随着理学这一新知识体系的兴起，“文统”话语在语义与功能层面经历了根本性的嬗变。

若要更为精准地把握“文统”话语的变迁过程，不仅需考察概念的语义变动，更需审视推动该变动的“时间意识结构”。科塞雷克提出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这一概念为此项工作提供了有效框架。⁵⁾但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本为解释西欧近代而设，故将其应用于东亚前现代是否妥当，尚需另行探讨。

在此方面，试图将概念史方法论应用于东亚的研究已有不少。韩国学者宋

2) “The more general the concepts,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parties that can make use of them.” Ibid., 253.

3) 陈子昂于《修竹篇并序》中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以此批判齐梁文风并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参见(唐)陈子昂撰，李凯校注，《陈子昂全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23年，第28页；韩愈在《荐士》中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以此认可陈子昂为先驱。参见(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9页。

4) 本文并未直接使用“文统”一词的文人亦纳入分析对象。此乃基于科塞雷克关于“史料概念(concepts embodied in sources)”与“分析范畴(scientific cognitive categories)”的区分。科塞雷克明言：“我们一方面处理体现于史料中的概念，另一方面处理科学的认知范畴。两者必须加以区分(We are therefore dealing, on the one hand, with concepts embodied in the sources and, on the other, with scientific cognitive categories. These must be distinguished).”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6.

5) 据科塞雷克所述，“经验”是过去事件得以统合并被记忆的“当前的过去(present past)”，而“期待”则是对尚未经验之未来的“当前化的未来(future made present)”。科塞雷克说明此两个范畴“因包含过去与未来，故适于处理历史时间(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 are two categories appropri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time because of the way that they embody past and future).” Ibid., 258-259.

寅在可谓该领域的代表。其曾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为克服既有图式化历史解释而接纳概念史的过程。宋寅在于2012年的论文中介绍了冯天瑜、孙江、黄兴涛等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界的概念史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此后于2016年探讨了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概念史研究通过与数字人文结合而扩展外延的趋势，2019年则发表论文论述了韩国进行的概念史相关研究如何获得本国地域性。⁶⁾

就中国而言，首先应提及前述的孙江。其在2018年的研究中强调概念史的“中国转向”，并主张概念若要成为研究对象，不能仅是单纯的词汇，而须是推动历史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他在文中指出，其核心标准之一即“政治化(Politicization)”，意即概念成为群体间斗争的工具与规划未来的武器。⁷⁾此外，方维规于2021年的研究中，提议将科塞雷克的“鞍型期(Sattelzeit)”与“历史时间”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转型期，从“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错位层面分析西方概念的接受与变异过程。他强调，中国的近代性概念不仅停留于单纯的时代“表征(Indikator)”，而应查明其作为推动历史变化的能动“因素”所发挥的作用。⁸⁾

然而，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近代转型期（19—20世纪）的政治、社会术语，尚难觅见针对前现代文论术语所展开的严格概念史分析。诚然，这一研究史上的空白亦为科塞雷克概念史话语本身内含的问题。这是因为概念史初以近代转型期为研究对象，且与政治史、社会史具有高度亲缘性。因此，本文将吸纳该方法论成果，将其应用对象扩展至前现代文学话语。

本研究将概念史应用于文学话语分析时，着眼于孙江提出的“概念的政治化”机制。他指出，概念的定型并非单纯的词汇固着，而是主体意图与政治目的

6) 宋寅在，〈概念史与中国历史学的革新〉，《中国与中国学》第16辑，2012年；宋寅在，〈东亚概念史与数字人文的相遇〉，《概念与沟通》第18辑，2016年；宋寅在，〈关于韩国概念史理论探索的考察与展望〉，《韩国学研究》第70辑，2019年。

7) 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第50卷第10期，2018年。

8) 方维规明言：“德国概念史的范式意义不会只适合西方”，并强调科塞雷克所提及的剧变期状况“能够见出不同地域或国家之过渡期的许多共性”。（两处引文均参见该论文第129页。）虽其论述侧重于对近代性的探索，但作为将分析西方的理论扩展至东亚脉络的尝试，其意义可见一斑。参见 方维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以科塞雷克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第53卷第1期，2021年。

介入的结果。⁹⁾ 本文认为, 此种“概念的政治化”逻辑不限于政治、社会领域, 在构建文学场域内部秩序方面亦同样可以有效运作。因唐代韩愈与宋代朱熹(1130-1200)所倡导的“文统”, 亦非自然发生的谱系, 而是投射了特定理论诉求并被有意建构的概念。因此, 孙江所分析的“概念形成技术”, 为阐明唐宋知识分子如何设计并利用“文统”概念以确立文学正统性, 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框架。

基于此方法论前提审视“文统”相关既有研究, 最为突显的问题便是对该话语缺乏独立观照或视角偏颇。就韩国学界而言, 鲜有将“文统”本身设定为文学史主要机制的研究, 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个别人物的文学论或文道关系论。¹⁰⁾ 中国学界虽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主要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视角差异。试举数例, 罗立刚将宋代视为文学逐渐脱离史学、道学而确立独立“文统”的过程; 反之, 祝尚书批判性地检讨该时期文学论, 认为理学家否定既有文统, 使文学从属于道学, 构建了“新文统”, 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¹¹⁾ 21世纪10年代, 韩星主张“道统”为本源、“文统”为其发扬的理想整合关系; 张申平则分析了苏轼的文艺中心文统论与朱熹的道学中心文统论虽对立却并存的现象。¹²⁾

综上所述, 既有研究多在“文统”的独立与从属, 或分离与统合的二元对立构图中展开争论。然而, 此种进路未能充分捕捉“文统”概念本身在文学史变迁中

9) 孙江在其论文中对“政治化”定义道: “语言操纵技术的发达, 如口号, 带有理论要求的概念按照自身意图对概念加以塑造或应用”(第154页)。此外, 他补充道: “概念的定型和政治-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制度关系密切”(第158页)。参见 孙江, 《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 《学术月刊》第50卷第10期, 2018年。

10) 在韩国研究方面, 代表性的有: 苏轶盛, 《周敦颐的文学与思想及其境界》, 《中国学报》第64辑, 2011年; 安熙珍, 《论苏轼的‘技道两进’》, 《中国学论丛》第40辑, 2013年; 李妍静, 《关于石介道统观的小考》, 《中国学论丛》第78辑, 2023年等, 探讨了周敦颐、苏轼、石介等个别人物的思想; 李相圭, 《朱熹的文道关系论》, 《中国语文学》第43辑, 2004年; 梁光锡, 《朱子的文学观研究》, 《儒教思想文化研究》第27辑, 2006年; 崔永嬉, 《朱熹文道论中体现的语言观》, 《泛韩哲学》第46辑 3期, 2007年等, 分析了朱熹的文道关系论。

11) 罗立刚, 《史统, 道统, 文统: 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5年; 祝尚书, 《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 《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12) 韩星, 《道统与文统关系论》, 《孔子研究》2018年第2期; 张申平, 《苏轼与朱熹文统观之比较》, 《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如何变形的动态过程。本研究将通过概念史进路克服这一局限，从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重构的视角，历史性地查明“文统”话语的变迁。

本文将唐宋时期“文统”话语的变迁视为文学正统性论述重组为政治哲学正统性话语的“理学化转向”，并旨在查明其样态。为此，本文结构如下：第二章检讨刘勰《文心雕龙》中“统”的原型意义，进而分析韩愈如何通过古文运动将“文统”重新定义为文学正统论的过程；第三章考察北宋时期“道”概念被形而上学地重新定义的过程，同时分析随着韩愈伦理学层面的“道”转化为程颐形而上学层面的“理”，“文”如何沦落至从属地位；第四章以南宋朱熹的文道关系论为中心，查明“文统”的理学化转向如何得以完成并固化。将审视朱熹主张“文道合一”并将“文统”完全隶属于“道统”的过程，以及通过其后学真德秀(1178-1235)的论述，考察此种理学“文统”观具体化的经过。

2. “文统”概念的形成及其初期展开：从刘勰到韩愈

“文统”话语的概念原型可于南朝梁刘勰(约465-约521)的《文心雕龙》中寻得。刘勰的论述预示了后世“文统”话语的两种核心可能性，就此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1) 《文心雕龙》中的“文统”原型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论述如下：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撮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鬣，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¹³⁾

13) (梁)刘勰著，郭绍虞、罗根泽主编，《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

上述引文可谓是将“文统”一词作为批评术语使用的首例。此处“统”不仅指延续系统，更意指规范文章整体结构与秩序的批评体系。“统”本指抽绎丝绪之始，由此衍生出“开端”、“根本”、“连续性”、“体系性”之义。¹⁴⁾

刘勰在《文心雕龙》多处运用了与“统”相关的词汇。例如“《易》统其首”¹⁵⁾、“世统”¹⁶⁾、“失统”¹⁷⁾等用例。刘勰借“统”字表达文体分类、构成原理及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些用例中，“统”时而意指“延续系统”，时而意指“具备体系”。此二义项在“文统”这一合成词中亦得以体现。

由此类用例可知，刘勰赋予了“文统”双重意涵。其一为“文学的正统谱系”，关乎何人继承文学本旨的问题；其二为“文章的构成体系”，关乎文章遵循何种原理与规则进行构成与评价的问题。本文将前者界定为“谱系性文统”，后者界定为“体系性文统”。

刘勰的论述主要侧重于后者，即“体系性文统”。在《通变》篇中，“文统”意指确立写作的整体规模（“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刘勰为实现该目标，提出了“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原理。其中“会通”与“适变”，历来注家多援引《周易》用例予以诠释。¹⁸⁾例如，黄侃视二句为“通变之要本”，其他注家亦将刘勰的论述解释为集中于“经博览与精阅以知取舍，并应时代之变”的写作原理。¹⁹⁾

521页。

14) 许慎《说文解字》释“统”为：“纪也。从糸充声。”据段玉裁注，《淮南子·泰族训》云：“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此即其本义。其义引申为凡“纲纪、规范”之称，《周易》郑玄注云“统，本也”，《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云“统，始也”。参见（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

15)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宗经》）”（梁）刘勰著，郭绍虞、罗根泽主编，《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22页。

16) “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书记》）”同上，第547页。

17)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同上，第513页。

18) “会通”源自《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适变”源自《周易·系辞下》：“唯变所适”。参见（梁）刘勰著，詹锼整理，《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第1102页。

19) 黄侃称：“博精二字最要。窃案‘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二语，尤为通变之要本。”参见（梁）刘勰著，郭绍虞、罗根泽主编，《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527

然而，考虑到刘勰的批评体系本身以儒家经典为文章的本源，“谱系性文统”的内涵亦本即内在于“文统”语汇之中。这种“文统”语汇的双重解释可能性，及至韩愈时期始得正式显现。

2) 韩愈古文运动与“文统”话语的正式确立

赞同古文运动的唐代文人，虽在文学立场上见解不尽相同，但在批判当时支配文坛的骈俪文这一点上，则达成了共识。²⁰⁾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俪文虽重对偶与华丽修辞，却因流于形式之美，面临丧失内容真实性与道德教化功能的指责。

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参与者，为矫正此种文坛弊端，主张回归先秦两汉时期质朴刚健的散文，即古文。在其看来，回归古文并非单纯的文体复古，而是试图通过“文”以恢复儒家之“道”的文学及思想改革运动。据郭预衡所论，韩愈通过〈上宰相书〉等文章表明，求官不单为衣食，而是为了行道；为文亦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²¹⁾韩愈的“文统”构想在其代表作〈原道〉与〈进学解〉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尽管韩愈在此两篇文本中并未直接使用“文统”一词，但均可从中得见相当于作为道之谱系的“道统”与作为文学谱系的“文统”这一双重构想。

首先考察〈原道〉。韩愈于此文中批判当时佛道之弊，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此即意味着构建从尧、舜至“孔孟之道”的谱系，即“道统”。²²⁾韩愈在提出此

页；《文心雕龙讲疏》释云：“览必博，阅必精，然后能识取舍之义，应随时之变。” 参见（梁）刘勰著，詹鍈整理，《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第1101页。

20) “古文运动从酝酿到成熟，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其实颇有差异；只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取得共识。因而，追溯隋唐文人之重提明道宗经，以及尝试使用散体单行文体，也就成了描述古文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21) “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上宰相书〉），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还曾明确地说自己的道即周公孔子之道。”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 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一道统谱系的同时，亦规定了“道”本身的意义。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²³⁾

由该句可知，“道”被界定为实践纲领。此处的“道”，乃是鼓励儒者参与现实、引导政治实践的原理，亦是当时儒家思想为强调现实功用而采用的策略性定义。²⁴⁾

此外，〈进学解〉是可窥韩愈文学观的篇章。韩愈于此所阐述的文学观较〈原道〉更为包容。韩愈在文中借学生之口，表明自身不仅以儒家经典，更广泛涉猎各类文章。

……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象，子云相如，同工异曲。²⁵⁾

引文中值得关注的是，韩愈列举的文献不限于儒家经典。在〈进学解〉中，韩愈将《庄子》、《离骚》、以及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亦纳入其文学视野。这表明对其而言，“文统”概念不囿于儒家正统性，而在评判文章的标准上，也承认“文学成就”的独立价值。

综合上述两段引文可知，韩愈关于古文运动的立场，旨在确立文学正统性

22)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唐）韩愈著，刘贞瑜、岳珍校注，〈原道〉，《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

23) 同上，第1页。

24) “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郭预衡，《中国散文史 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25) （唐）韩愈著，刘贞瑜、岳珍校注，〈进学解〉，《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7页。

（“文统”）以恢复思想正统性（“道统”），这是一项既二元又相互关联的规划。在他提出的著名命题“修其辞以明其道”²⁶⁾中，亦可确认“辞”与“道”并存的现象。即，“文”与“道”虽相联结，却分属不同领域；“道统”与“文统”虽乍看相似，但至少对韩愈而言，是作为各别的范畴而使用的。然而，此种将“文”与“道”分置的立场，后为宋代理学家所批判。²⁷⁾他们认为“文”与“道”本不可二分，韩愈的构想仍过于倚重文辞。“道”与“文”这两大谱系，在韩愈活动时期尚未融合为单一体系；而正是这一未融合的状态，成为后世理学家重构“文统”话语的起点。

从概念史视角来看，韩愈堪称将刘勰预备的“文统”双重可能性中的“谱系性文统”加以正式确立的人物。科塞雷克认为，“同一单词的含义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同一性？是否随时间流逝而变？历史变革是否重构了概念的意义？”此即概念史的核心课题。²⁸⁾

以此视角视之，韩愈堪称重构“文统”词义的首位主要人物。他在继承刘勰“体系性文统”的同时，将重心移向确立文学正统谱系的“谱系性文统”。继起的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颐与朱熹，试图重构韩愈的构想。他们试图通过将“道”与“文”各自的谱系统合于“理”这一单一原理之下，从根本上改变“文统”话语的性质。

若以概念史视之，韩愈的“文统”构建实乃一次深刻的时间意识重组。他并未将过去视作单纯的时间残留，而是将其转化为指向未来的“期待视域”。即，通过借由“复古”以“开新”的悖论性逻辑，韩愈成功将先秦两汉的文学遗产重构为能够救济当下的“经验空间”。这种在“回顾”中寻求“展望”的思维模式，不仅克服了六朝以来的断裂感，更在经验与期待之间构筑了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正统性。这

26)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唐）韩愈著，刘贞瑜、岳珍校注，〈谏臣论〉，《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70页。

27) 关于朱熹批判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一事，详见本文第四章。

28) “To what extent has the intentional substance of one and the same word remained the same? Has it chang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having reconstructed the sense of the concept?”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2.

也正是“文统”概念得以确立并具备革新动力的根源所在。

3. 北宋理学的“道统”论与文学观的转变

韩愈奠基的“文统”话语至北宋时期面临重大转折。这并非单纯的思想潮流更替，而是思维范式发生的根本性转向。理学的兴起将“道”的概念从实践纲领重构为形而上学原理，“文”的地位与功能随之也必须接受重新定位。

1) “文以载道”论的兴起与“文”地位的变化

与唐代以前的儒学发展路径不同，北宋知识分子面临着须抗衡佛教盛行风潮与当时文坛浮华文风并构建儒家固有体系的双重时代课题。²⁹⁾

宋代道学先驱周敦颐(1017-1073)率先回应了这一挑战。周敦颐于《通书·文辞》篇提出了“文以载道”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³⁰⁾

周敦颐认可文辞的传播功能(“美则爱，爱则传焉”)，甚至援引《孔子家语》中“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句以肯定文章的必要性。但其论述的关键，在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一界定。由此，文章沦为仅为载道的手段(“用”)，被

29) 陈来强调，宋初的排佛论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批判，实为“对明周孔之道的学问的呼唤”。欧阳修所提“修其本”，旨在为涤除佛教之弊，须恢复儒家之礼义与王政。参见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2-43页。

30) (宋)周敦颐撰，(宋)朱熹注，《太极图说 通书》，济南：齐鲁书社，2024年，第53-54页。

置于从属于道德这一实质(“体”)的地位。

此种体用论层面的价值序列,与韩愈的立场有着根本区别。对韩愈而言,“文”与“道”虽相连属,却分属不同领域;其文学成就独立于“道”之外,拥有独立价值。反观周敦頤,文章的价值仅在传道之限度内方获认可,沦为单纯的工具。

虽以韩愈为首的唐代古文家亦强调“道”,但其所论的“道”,除宣扬道统外,尚具针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功能,且呈现“重道而不轻文”的倾向。相对而言,宋代理学家所强调的“道”,不仅具有“心性义理”的特定意涵,更将“文”视作单纯工具。³¹⁾

从周敦頤、张载(1020-1077)至程颢(1032-1085)、程頤(1033-1107)等人物的相继登场,标志着理学在思想层面日趋深化的过程。他们不再将“道”局限于韩愈所论社会伦理实践纲领的范畴,而是将其等同于宇宙万物之存在依据及运行原理——即“理”。如果周敦頤将文章规定为载道的工具,则程頤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质疑“作文”行为本身。

2) “道”概念的形而上学转向与“文”的工具化

若说周敦頤通过“文以载道”论设定了“文”的从属地位,程頤则将其推向极端。³²⁾他将文学行为本身定界为体道圣人内心的自然流露。

31) “古文家所提倡的道,除有宣传道统方面的意义外,还有如前所述的批判作用,并重道而不轻文。而宋理学家所强调的道,不仅有其特定含义——心性的义理之学,而且,把‘文’看做只是简单工具。” 赵则诚、张连第等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词典》,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518-519页。

32) 诚然,周敦頤的“文以载道”侧重于将“文”视为教化之具,而程頤则更倾向于将“文”视为圣人之道之自然流露,二者在理论层面确存精微之辨。然而,就“文”不再拥有独立于“道”的自律价值,而转变为“道”的从属概念这一宏观历史脉络而言,本研究认为,两者的逻辑指向是一致的。鉴于本研究旨在考察“文统”概念的整体理学化转向,故将此二人置于同一连续体中加以考察,而未详论其个别差异。

圣人文章，自然与学为文者不同。如系辞之文，后人决学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为之者，或有绘画为之者，看时虽似相类，然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³³⁾

在其看来，圣人之文并非习得人为“作文”技巧的产物，而仅是“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的自然流露。他强调圣人之“文”与文学技巧有着本质区别，并警惕将作文视为目的本身。³⁴⁾这一观点与韩愈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韩愈主张通过作为文人的自觉努力取得文学成就，并将“文”与“道”设定为互补领域。

换言之，程颢对韩愈的批判始于“德”与“文”的先后问题。他指出：“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³⁵⁾批评韩愈颠倒了德本文末的关系。在程颢看来，韩愈是因研磨文章而触及道的境界，并非先修德而后发见为文。这实际上是将韩愈定性为研习“文人之学”而非“圣人之学”的人物。

更有甚者，程颢进而论及“作文”之害。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³⁶⁾

该段引文充分揭示了宋代道学家的立场。在程颢看来，沉溺于写作即是有损自我修养。与此相类，程颢曾言：“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³⁷⁾其将文章之学列为首弊，实与其“作文害道”的立场一脉相承。

这一变化导致了当时知识场域中新等级秩序的生成。探究宇宙终极原理

33) (宋)程颢撰，邵逝夫导读，《河南程氏遗书》，合肥：黄山书社，2022年，第375页。

34) “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同上，第374页。

35)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同上，第367页。

36) (宋)程颢撰，邵逝夫导读，《河南程氏遗书》，合肥：黄山书社，2022年，第374页。

37) 同上，第322页。

“理”的理学或道学登上了所有学问的顶点，而文学等其他学问则沦为仅在阐明“理”的限度内价值方获认可的次要活动。钱穆指出，北宋初期学术虽多源于韩愈而重文章，而至中期则转向排斥文学、独重道学。³⁸⁾

上述思维体系的转向导致了“文统”概念的转变。一旦“道”被重塑为唯一且整全的宇宙原理，仅基于文学价值或历史权威的“文统”便无法主张其自身的独立性。随着“道统”地位的凸显，³⁹⁾“文统”不得不从属于“道统”的下位范畴，抑或沦落至话语场域的边缘。

北宋时期形成的这一新“期待视域”，旨在将所有学问统摄于“理”这一单一原理之下。此视域强大而包容，未给韩愈以来积累的古文传统与对文学成就的认可——即文学固有的“经验空间”——留下独立存续的余地。这不仅超越了单纯文学观的差异，更以此拉开了重构整体知识场域尝试的序幕。众所周知，在这一进程中成功获得权威的道学逻辑，其后数百年间成为了中国评判文学价值的根基。

借用科塞雷克的分析框架，此一过程可被解读为“期待”对“经验”的压倒性超越。诚然，北宋理学家亦怀有强烈的‘复古’意识，但与韩愈试图通过文学积累（经验）来重建正统不同，理学家的‘复古’乃是一种越过文学表象、直指形而上本体的“根本主义”诉求。

周敦颐将文辞界定为单纯的“艺”与“虚车”，程颐则批评韩愈“倒学”，认为因磨练文章而触及道，乃是倒置本末。这意味着，若缺乏“道”这一绝对“期待”的充实，文学所积累的“经验空间”不过是无用的装饰或应被摒弃的末节。在此视域下，文学不再是通往真理的桥梁，反而被判定为可能遮蔽“理”的“负面因素”，从

38) “初期风气，颇多导源于韩愈，因遂注意于文章。……而中期则绝对对文章有兴趣。……但二程兄弟，讲学多用语条体，直如禅宗祖师们，虽是洁净朴实，但摈弃文学，便减少了活的人生情味，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39) 对此，李春青描述称，宋代儒者视“道统”如“身家性命一般”。不仅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乃至程颐、张载、范育等道学家，众多人物皆抱有“舍我其谁”之心态，主张自身为孔孟之继承者。参见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6页。

而确立了以“理”单方面规训“文”的垂直结构。

4. 朱熹的文道关系论与“文统”的重构

始于北宋的知识转向至南宋朱熹时期，发展出更为严密的体系性。朱熹综合并批判性地重构了前代学者的论述，确立了以“理”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在此过程中，自韩愈以来的“文统”话语最终被统摄于“道统”逻辑之下，其意义也随之固化。

1) 朱熹的“文道合一”论与“文统”的理论从属

朱熹的文学论可概括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⁴⁰⁾这一命题。此论与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有所区别。在周敦颐看来，“文”乃承载“道”的手段，即在文道分离的状态下，发挥着承载道的作用。反观朱熹，“文”被视为从“道”中流出的产物。文与道本为一，文乃道的自然流露。二者差异看似微小，但在朱熹的逻辑中，“文”不再是独立实体，不过是“道”的衍生物。这一逻辑也成为其批判一切分离“文”与“道”倾向的理论依据。

基于这一观点，朱熹视前代文人的立场尚有未尽之处。他在《读唐志》中引用欧阳修的评语后评论道：“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出于二也。”⁴¹⁾在其看来，将道德与文章一分为二绝不可行。这意味着“文”无法脱离“道”而独立为另一领域。因此，韩愈及其继承者的立场自然成

40) “此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宋）黄士毅编，徐时仪、杨联葵校，《朱子语类校辑》（全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51页。

41) “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出于二也。”（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新订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3-3374页。

为朱熹批判的对象。

实际上，朱熹曾评价韩愈“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⁴²⁾并批判韩愈及其门人“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致使“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倒悬逆置。⁴³⁾如果说韩愈通过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的命题设定了文道互补关系，朱熹则是将“道”置于绝对前提，规定“文”为其附属物。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文统”构想依然过分偏重于“文”。

朱熹这一立场代表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倾向。正如张申平所指，宋代理学家于文道关系中将“道”的内涵界定为孔孟之道，侧重于道德性理的学说。他们忽视作家个人思想情感的表现，这势必造成“重道与重情，功利性与审美性的二元对立”。⁴⁴⁾在这一对立构图中，理学家向“道”倾斜，致使“文”的独立价值遭到否定。强调“文”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文统”话语，在此架构下自难主张其正当性。

至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作为文学批评自律体系的“文统”，以及韩愈兼容并包的作为文学正统性的“文统”，均丧失了其原有意义。在朱熹看来，“文统”完全从属于“道统”，其正当性仅在作为“道”之显现时方获认可。同一概念词已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内容。

2) “文统”重构的实践与概念的固化

朱熹的文学观通过其后学得体现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堪称其代表人物。作为南宋末叶备受推崇的主要理学家，他素以对文

42) 朱熹，《朱子语类·吕伯恭》。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

43) “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新订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5页。

44) “宋代理学家把文道关系中‘道’的内涵界定为孔孟古道，理学家则侧重于道德性理之说。他们都不重视作家个人思想情感的表现，这势必造成文章的重道与重情，功利性与审美性的二元对立。”张申平，《宋代古文文统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第122-123页。

章标准的严苛与拘谨著称。这一点在其文章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以“是否得当论理”评价文章优劣，还是主张濂洛诸贤之文非董仲舒、韩愈所能匹敌，皆可佐证。⁴⁵⁾

集中体现这一态度的著作莫过于《文章正宗》。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堪称理学“文统”观念的具体结晶。他在序言中批判既有文学选集的传统，发问道：“世之所行，唯《文选》、《文粹》二书……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此外，他如下阐明了自己的编纂标准：

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采⁴⁶⁾

这意味着，其文章甄选的首要标准并非文体或文学成就，而是义理。真德秀的立场标志着一种与韩愈“文统”根本不同的新“文统”观念的确立。诚如祝尚书所指出：“韩愈的‘文统’游离在‘道统’之外，统的是包括‘百家之编’在内的所有的‘文’，而以词章为主。理学家的‘文统’则仅仅是‘道’这个‘根本’生出来的‘枝叶’，它从属于‘道统’，统的只是‘道之文’。”⁴⁷⁾韩愈的“文统”乃基于文学成就的独立谱系，而真德秀的“文统”则是作为“道统”的下位范畴、基于“义理”而重构的谱系。

然则，从概念史视角出发，应如何理解此种变化？科塞雷克曾指出：“单词被持续使用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其核心意义具有稳定性的充分指标。”⁴⁸⁾“文统”一词虽自刘勰至真德秀延续使用，但其意义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从

45) “对于文章，也曾有迂腐之论。所撰《文章正宗》，‘主于论理而不论文’，选文标准，至为偏激。……他还有一篇《跋彭忠肃公文集》，评论历代文章得失，也相当迂执。……又说宋文之盛，超过汉唐，濂洛诸公之文如《太极》、《西铭》，‘非董、韩之可匹’。这就是说，濂洛讲学之作，乃天下第一流的文章。”郭预衡，《中国散文史 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7页。

46)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首〈纲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5页。

47) “韩愈的‘文统’游离在‘道统’之外，统的是包括‘百家之编’在内的所有的‘文’，而以词章为主。理学家的‘文统’则仅仅是‘道’这个‘根本’生出来的‘枝叶’，它从属于‘道统’，统的只是‘道之文’。”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第87页。

刘勰的“体系性文统”演变为韩愈的“谱系性文统”，再至朱熹、真德秀的“道统从属性文统”，这实为同一概念词的内涵被不断重构的历程。

此类概念词的变迁亦可用科塞雷克提出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框架加以阐释。据科塞雷克所述：“面向未来开放的经验空间从自身引出期待视域。经验释放并导向预测。”⁴⁹⁾韩愈基于六朝骈俪文弊端的“经验空间”，确立复兴古文的“期待视域”，以此构筑了指向过去的“连续性”——亦即“参照”——关系。北宋周敦頤、程頤虽繼承韩愈的文章革新运动，却提出了以“理”为中心的新“期待视域”。此时期“文统”处于与“道统”的紧张关系中，面临“扩展”的局面。而及至南宋朱熹与真德秀，“文”完全从属于“道”，这便意味着与韩愈所构建的“文统”原义之间发生了“分歧”。

〈表 1〉基于科塞雷克“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文统”话语变迁

时代 (主要论者)	经验空间 (过去的积累)	期待视域 (未来的规划)	经验-期待关系
南朝 (刘勰)	先秦两汉以来的文学传统；文章创作的实践经验积累	确立文学批评的体系性原理；“规略文统”；“会通”与“适变”	潜在：提示概念的可能性
唐代 (韩愈)	六朝骈俪文之弊；形式主义过甚，内容空虚；丧失文章教化功能	通过古文复兴恢复儒家之道；“修其辞以明其道”；构建文学谱系	连续：经验与期待的呼应
北宋 (周敦頤、程頤)	唐代古文运动之成果；既有文学成就	体现“理”之文章；“文以载道”；“作文害道”；道德优先	紧张：经验与期待的差距扩大
南宋 (朱熹及其后学)	前代文学传统；但至真德秀而趋于极端	从属于“道统”的文章；“文从道中流出”；“辞虽工亦不杂”	分歧：经验与期待的乖离

48) “The fact that a word has remained in constant use is not in itself sufficient indication of stability in its substantial meaning.”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2.

49) “the space of experience, open toward the future, draws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out of itself. Experiences release and direct prognoses.” *Ibid.*, 262.

上表所示的“经验—期待关系”，基于科塞雷克旨在说明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间动态关系的概念。据科塞雷克所述：“经验与期待之间的张力在不断变化的模式中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并由此生成历史时间。”⁵⁰⁾

刘勰“潜在”地提示了“文统”概念的可能性，韩愈将其正式确立，构建了与过去传统“连续”的文学谱系。北宋周敦颐、程颢提出名为“理”的新期待视域，引发了与既有文学传统的“紧张”。及至南宋朱熹与真德秀，“文统”被完全统摄于“道统”之下，致使与韩愈所构建的“文统”原义发生了“分歧”。

真德秀所宣称的“辞虽工，亦不彘”，表明以文学成就本身为正统性依据的韩愈“文统”构想最终遭废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作为文学批评自律体系的“文统”，以及韩愈兼容并包的作为文学正统性的“文统”，至此均丧失其本来意义。对朱熹与真德秀而言，“文统”乃从属于“道统”的存在，即仅作为“道”的显现方被认可其正当性。同一概念词的内涵已发生根本性置换，即从生成历史时间的动力性概念，最终固化为维系道统秩序的静态范畴。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唐宋时期界定为“文统”概念重构的关键转型期，并运用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方法论，追踪了其意义重构的过程。通过分析从刘勰至真德秀的话语轨迹，确认了“文统”经历了一个“理化转向”的过程，即从承载文学独立性的概念，逐渐被理学的道统论所统摄，演变为从属概念。

“文统”概念的形成与展开过程，可通过“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互动加以阶段性阐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开启了体系性原理与谱系性正统的双重

50) “It is the tens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 which, in ever-changing patterns, brings about new resolutions and through this generates historical time.”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3.

可能性，但将其确立为具体的“谱系性文统”者，实为韩愈。韩愈选择性地重构了前代文学积累的“经验空间”，并将其与恢复儒家之道这一“期待视域”相结合。至此，“文统”虽与“道统”紧密相连，却仍保有互补的独立领域。但经由北宋周敦頤与程頤，“道”的形而上学地位得以强化，文学固有的经验空间开始面临丧失独立存续依据的危机。最终，至南宋朱熹与真德秀，“文统”彻底从属于“道统”这一下位范畴；随着文学自律性在“理”这一单一原理下被消解，概念随之固化。

上述分析表明，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西欧近代，亦可成为东亚前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有效分析框架。各时代知识分子关于“文统”的论述，并非单纯的文体论争，而是关于如何将过去文学遗产现实化并确立为未来路向的激烈思辨产物。本研究展示了透过“文统”这一棱镜，可将唐宋变革期的文学史把握为概念的生成、紧张及重构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态事实的罗列。

然而，本研究尚存如下局限。其一，因将讨论对象限定于文学论与思想史文本，未能深入论证“文统”话语在实际文学创作中如何具象化。究其原因，探究概念的理论展开与创作实践之关系，需庞大的作品分析，受篇幅所限，本稿难以充分展开。其二，推动概念变迁的外在因素，即科举制度的变化或学派间政治力学关系等社会、制度脉络，未纳入本稿讨论范畴。虽然这符合本研究聚焦概念史分析的宗旨，但此类脉络对概念变迁的影响，仍需另行深究。其三，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唐宋转型期，未能进一步展望“文统”概念在元明清乃至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长时段演变与接受情况。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史扩展课题，亦将留待日后研究加以补充。

参考文献

1. 古籍与工具书

- (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 (梁)刘勰著, 郭绍虞、罗根泽主编, 《文心雕龙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
- (梁)刘勰著, 詹镛整理, 《文心雕龙义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
- (唐)陈子昂撰, 李凯校注, 《陈子昂全集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23年。
- (唐)韩愈著, 钱仲联集释,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 (唐)韩愈著, 刘贞瑜、岳珍校注,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年。
- (宋)周敦颐撰, (宋)朱熹注, 《太极图说 通书》, 济南: 齐鲁书社, 2024年。
- (宋)程颐撰, 邵逝夫导读, 《河南程氏遗书》, 合肥: 黄山书社, 2022年。
- (宋)朱熹撰,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新订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 (宋)真德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文章正宗》,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宋)黄土毅编, 徐时仪、杨联癸校, 《朱子语类校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
- 赵则诚、张连第等编,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词典》,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年。

2. 著作

-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陈来, 《宋明理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 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张申平,《宋代古文文统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

3. 期刊论文

方维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以科塞雷克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第53辑,2021年。

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第50辑,2018年。

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文学遗产》第5辑,2006年。

Abstract

The Neo-Confucian Turn of the “Wentong” Concept in the Tang-Song Period

Park, Sung Won

The concept of “wentong (文統, literary orthodoxy)” serves as a core term characterizing literary orthodox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been confined to the context of Han Yu’s Ancient Prose Movement or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lacking a diachronic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s semantic shifts. To bridge this gap, this study applies Reinhart Koselleck’s methodology of Begriffsgeschichte (conceptual history)—specifically the framework of “space of experience (Erfahrungsraum)”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Erwartungshorizont)” —to trac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wentong concept from the Tang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wentong” existed merely as a latent possibility in Liu Xie’s discourse, it was established by Han Yu as an independent literary genealogy coexisting with “daotong (道統, moral orthodoxy).” However, following a reconstruction by Northern Song Neo-Confucians, the concept eventually underwent a process of “Neo-Confucianization” under Zhu Xi in the Southern Song, becoming completely subordinated to daoto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ang-Song literary history should be viewed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ceptual genesis, tension, and reconfiguration, and furthermore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applying conceptual history methodology to the study of pre-modern East A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 words: Wentong, Begriffsgeschichte, Neo-Confucianization, “Discourse on literature and Dao”, “Literature as a vehicle for the Way”

투 고 일 : 2026. 1. 10. / 심 사 일 : 2026. 1. 15.~ 2026.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2. 20.

